

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④

沈尔七

三度回国抗战的华侨烈士



沈尔七，原名沈庆炬，1914年出生于福建晋江。

1930年，沈尔七前往菲律宾谋生。他白天工作，晚上参加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属下的青工俱乐部活动，积极接受进步思想，在工运中表现出宣传、组织的才能。

“九一八”事变后，沈尔七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和马尼拉华侨学生一起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刊物《旗声》。1934年，沈尔七被推选为菲律宾华侨总工会组织部长，负责建立基层组织、发动工人。1936年初，他又参与在菲律宾华侨中组织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并被推举为秘书长。该会是当时旅菲华侨中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沈尔七主持出版该会会刊《民族战斗》，撰写多篇战斗檄文，呼吁团结抗日，一次又一次吹响了抵御外敌的号角。

陪伴沈尔七革命生涯的钢笔，藏于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

1938年初，沈尔七率领由华侨青年组成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回国参战，编入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的新四军二支队，这是新四军中的第一支华侨队伍。该支队后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沈尔七任团长。队伍随军一路到达皖南，接收军政训练。

后沈尔七奉调至新四军政治部下属的民运部（处）工作，在皖南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和1940年，为进一步扩大新四军影响，更广泛地争取海外侨胞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沈尔七受组织派遣，两度返回菲律宾开展宣传动员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在沈尔七的感召带动下，一支菲律宾华侨热血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毅然追随他回国参战。

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沈尔七无暇顾及家中。1938年5月，他在皖南接到母亲的信后，写了一封回信：“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笔墨之间饱含血脉亲情，又充满革命斗志，表现了他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豪情壮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沈尔七再度从菲律宾回国，进入广东省东江游击区，投身抗日战场，历任东江抗日游击纵队第二中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与成中队”（为纪念何与成烈士命名）指导员。1942年，沈尔七因负伤并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住院治疗。同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趁新四军主力转移之机偷袭了他接受治疗并兼任政治指导员的铁岗医院，残杀数十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制造了“铁岗事件”。面对数十倍的敌人，沈尔七临危不惧，为掩护其他伤病员撤退而不幸中弹身亡。时年仅28岁。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从1930年离家到1942年牺牲的12年间，沈尔七三度回国抗战，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他未能踏入家门一次。他写下的那些抗日救亡的战斗檄文，激发鼓舞了无数海外华侨同仇敌忾抗日斗志；他那封充满家国情怀和革命激情的信笺，彰显了共产党人牺牲小家为大家、舍身为国的崇高精神；他用短暂的青春与生命践行了“为光明事业努力”的誓言。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③

从一位归国华侨青年，成长为新中国军乐事业里程碑式人物，罗浪走过抗战的烽火，见证解放的号角，指挥开国大典激昂的国歌，为新中国军乐的发展和建设夯基培土。近日，罗浪之女罗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父亲一路走来，不变的是他为民族创作的初心。以下是罗静的讲述。



1995年，罗浪授衔后拍摄的肖像。（受访对象供图）



罗浪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指挥军乐队奏乐。

（视频截图）

马来西亚归侨、开国大典军乐队总指挥罗浪之女罗静回忆——

父亲用军乐表达赤子之心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晋察冀大地走出的军乐人

1937年，17岁的父亲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回国求学。可是在日寇燃起的烽火狼烟下，当时偌大的中国，竟已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课桌。父亲到上海不久，亲历日军炮制的“八·一三事变”，所在的暨南大学高中部，校舍被炸为废墟。不得已，他只能乘坐难民船离开上海，此后又辗转广西、香港等多地求学，但经历都难言平顺。

1938年6月，父亲和几位华侨青年好友决心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他们历时一个多月，经广州、武汉、西安，抵达延安南面的看花宫，进入陕北公学培训。这年底，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到陕北公学招生。父亲此前接触过音乐，考试时凭借一首饱含抗日决心的《松花江上》顺利考取了鲁艺，成为音乐系第三组学员。

延安鲁艺的生涯是父亲一生难忘的经历。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了文艺理论与音乐基础知识，还师从冼星海、吕驥、向隅、李焕之等音乐大家学习指挥和作曲，成为冼星海排演《黄河大合唱》时的首演队员之一，负责吹口琴和打鼓。那时，乐队只有3把小提琴是西洋乐器，其余只有少量二胡、三弦、笛子、口琴，还有一把用汽油桶自制的低音琴，打击乐只有鼓。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冼星海却谱出了富有中国气势的雄壮乐曲，这种为中用、因地制宜的音乐理念对父亲产生极大影响，用音乐表达爱国的方式也深刻启发了父亲。1939年底，父亲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他把这些创作理念都带到了根据地，立足当地条件创作了大量歌唱抗战的新作品。

在晋察冀敌后抗战的岁月中，父亲一边跟随部队与敌周旋，一边开展宣传工作，用音乐慰劳战士、鼓舞斗志。他在一分区担任音乐教员和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担任音乐队长期间，多次指挥《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曲目的演出，并组织排演话剧、歌剧、活报剧。1941年，为纪念“狼牙山五壮士”掩护一分区部队转移，父亲为《五壮士之歌》谱曲，创作了《五勇士故事歌》。此后，还创作了《保卫一分区》《七月小唱》《当兵谣》等作品，并为歌剧《从军曲》作曲。他创作或谱曲的歌谣、大合唱及歌曲曲目通俗易懂，许多作品在根据地的部队和百姓间广为流传。

解放战争期间，清风店战役大捷，聂荣臻率领晋察冀野战军大败国民党第三军。第三军有一个军乐队，父亲接到收编并重组军乐队的命令。他骑着缴获的自行车四处奔波，从各个俘虏营召集分散的乐队队员，并找到长笛、黑管等20多件乐器，加上原有的乐队队员，组成了一支数十人

的新乐队。这一时期，父亲开始尝试将革命歌曲改编为军乐。1948年初，随着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改编，这支乐队重组为华北军区军乐队，父亲任队长兼指挥。

开国大典奏响中国典礼乐

1949年，三伏已尽，恰至新秋。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新中国的黎明。共和国的首都定在北平，由华北军区承办开国大典。指挥开国大典军乐队的职责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父亲的身上，这年父亲只有29岁。

那年，父亲奉命组建联合军乐队，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基础，联合了受阅部队各军、师的军乐队，并邀请华北文工团接管的原北平较有名气的警察局军乐队，从中挑选了100多名乐手，组织成一支近200人的联合军乐团。

1949年9月召开的一次阅兵训练会上，父亲提出了开国大典用什么典礼音乐的问题。众人提出不同意见。有人提议使用当时国际通用的德国典礼乐，也有人主张使用苏联的乐曲。就在很多人赞同使用苏联音乐时，父亲提出了第三种方案：用中国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作为典礼音乐。会后，三种方案一起报送中央。

父亲在方案中详细列出了典礼的拟奏曲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东方红》；阅兵式演奏《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骑兵进行曲》等；群众游行演奏《团结就是力量》等。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敲定了由中国乐曲作为开国大典音乐的方案。这让父亲倍感鼓舞。

典礼音乐方案确立，在阅兵训练中又出现新问题。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刚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硬仗”，战士们习惯了在战场上冲杀，突然要结合音乐的节奏齐步或正步走，大家一时难以适应。排练常因军乐队鼓点和部队步伐不同步而“乱套”。此外，鼓手按惯例站在军乐队后排，鼓声打在天安门附近建筑的墙壁上，加剧了战士们听到的不整齐声音。父亲反复思考对策后，把鼓手安排在乐队最前排，和阅兵队伍距离更近，让战士们听到的鼓声更大、更清晰，再把乐曲每小节起始时敲鼓两下改为敲一下，都敲在战士迈左腿的动作上，鼓点更少更易走整齐。如此一改，部队和乐队的配合立刻改观。

开国大典前，还出现一个小插曲。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然而，两天后父亲才接到通知。他挑灯赶出和声部分，并让所有队员连夜抄写分谱。幸而《义勇军进行曲》广为传唱，军乐队每个队员对曲调十分熟悉，排练时间虽紧，但效果不打折扣。1949年9月30日下

午，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父亲指挥军乐队进行了国歌的首次演奏。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军乐队在天安门广场指定位置列队完毕。父亲站在军乐队最前方，身后是两名副指挥各率一个百人方阵。

下午3点，开国大典拉开序幕。随着“升国旗”的一声令下，父亲挥动指挥棒，身后的军乐队立即迸发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曲调。当国歌响起时，整个广场一片欢腾。

当天，军乐队上场的195名队员站立了5个小时，圆满演奏了开国大典的典礼音乐。父亲后来说，这是他完成得最好的一次任务。

传道授业播撒军乐火种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曾接到为张家口阵亡烈士悼念仪式奏乐的任务。父亲说，当他看到烈士遗体还保持着战斗姿态时，决心对民间流传的《哀乐》进行改编，使曲调在哀伤同时增加激昂之音，意在哀而不悲，化悲痛为力量。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军乐队演奏的就是父亲重新编曲的《哀乐》。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还曾对《东方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军队进行曲》等数十首军乐曲和礼乐曲进行创作或改编，许多作品广为为人知。

父亲对中国军乐事业的贡献，还在于对军乐人才的培养。1951年，父亲负责组建千人军乐团并担任团长。为了提高军乐团的专业素养，他选拔队员前往上海参加管乐团训练，请每种乐器的名家对队员作针对性培训。1954年，父亲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军乐处处长，组织编写了一批军乐教材，印发全军各军乐队。1956年，他倡议成立中国第一所军乐学校并担任校长，为全军输送了大批军乐人才。

父亲关注教育事业，去世前曾叮嘱我们子女7人，要把自己10万元左右积蓄捐给家乡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雷峰镇潘祠村，资助贫困生上学。2019年，当地教育部门宣布以这笔捐款设立专项基金后，在乡亲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为基金捐款。如今，原本10万元的基金已扩充为20余万元的“罗浪乡亲奖助学金”。也是在近年回乡参与奖学金颁发过程中，我才得知，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就曾多次捐助过家乡学校购买图书。

2015年7月，父亲去世。八宝山殡仪馆兰厅挽联上写着“游子赤子子子五线谱中弹指金钟迴响军乐军影军教开国典上挥棒袞袞流芳”，此言不虚。自回国前往延安学习时起，父亲就始终坚持为中华民族进行音乐创作，这种坚持充分体现了父亲的深深爱国情、拳拳赤子心。

全球华侨华人共盼冰雪之约

□ 李其荣

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在向我们走来，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一件盛事。北京冬奥会牵动着海内外侨胞的心。讲好北京冬奥会故事，提升冬奥会全球影响力，全球华侨华人正成为北京冬奥会的见证者、宣讲者和助力者。

全球华侨华人是北京冬奥会的见证者。海内外侨胞通过多样方式迎接北京冬奥会，表达对北京举办冬奥会的热情与祝愿。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100天来临之际，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110多个侨团的侨胞代表，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平台“云相聚”，喜迎冬奥百日。此前，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数十名世界知名华侨华人艺术家在举行迎冬奥快闪活动。“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正逐步走向现实，也牵动着海外侨胞的心。”“希望北京冬奥会能作为桥梁联系起五洲四海的朋友，带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华侨华人的殷殷寄语，传递着海外中华儿女对北京冬奥会的热切期盼。

全球华侨华人是北京冬奥会的宣讲者。自从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以来，海外华文媒体密切关注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展，用文字和镜头向华侨华人及当地社会讲好北京冬奥会故事。瑞士《欧时时报》在报社网站、新媒体及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预热报道。加拿大维多利亚传媒在网站、微信等平台，持续介绍北京冬奥会筹备情况，并专门派记者到中国采访场馆建设消息。海外华文媒体还运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各种新媒体形式，放大传播效应，紧扣北京冬奥会主题，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冬奥故事。

全球华侨华人是北京冬奥会的助力者。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开展北京冬奥会相关民间交往活动，多场合、多形式开展北京冬奥会推介会和讲解会，在侨团活动中融入北京冬奥议题，开展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北京冬奥会相关系列活动，争取更多住在国民众支持北京冬奥会。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主办迎接2022北京冬奥系列活动，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百余人相聚

温哥华冬奥会火炬广场，合唱奥运歌曲，举办庆祝活动，传递奥运精神。此外，海外华侨华人为北京冬奥会建言献策，引荐高水平赛事组织管理、技术支持、服务保障等方面专家人才，参与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全球华侨华人为北京办好冬奥会尽心尽力，为北京冬奥会走向世界千家万户再添助力。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北京冬奥会不仅是奥运精神不断传承弘扬的生动体现，也是全球华侨华人团结共圆奥运梦的热血时刻。北京冬奥会有“纯洁的冰雪”，更有“激情的约会”。全球华侨华人共同期待奥运健儿一展英姿，热切期盼北京冬奥会再创辉煌！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侨乡新貌

龙舟竞渡

12月5日，浙江省金华市举行第五届中国·金华龙舟邀请赛。来自浙江省各地的14支男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图为三江六岸燕尾洲段水域，龙舟竞相追逐，向终点冲刺。

胡肖飞摄（人民视觉）